

#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何爱国<sup>1</sup>, 颜英<sup>2</sup>

(1.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2.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44)

**摘要:**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批判疑古史学最为激烈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基于其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谓疑古史学推倒经、子、古史, 起到推翻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史的负面作用。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既有其犀利深刻之处, 如对其史观与方法论的批判, 亦有一些失误, 主要是苛责太深, 如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否定。

**关键词:**疑古史学; 章太炎; 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认同;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1-0144-10

## 一 “其说遍于国中”: 章太炎激烈批判疑古史学的历史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 随着以学习西方为主导的富强思潮的强劲兴起,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愈来愈猛烈, 经学、儒家、诸子、道教, 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受到越来越大的怀疑, 由此推动疑古思潮大兴。据民国时期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回顾: “到了清代后期, 经今文学派兴起, 疑古的精神大炽”, “等到廖平、康有为、崔适等继起, 更大举对古文经攻击, 而且又连带地怀疑到古史传说上, 认为古史传说多出于诸子的创造, 用来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 这样一来, ‘疑古’的学风便一发而不可遏了”<sup>[1]123</sup>。经今文学派的兴起, 既是清代学术内部学理的一种嬗变, 也是晚清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的一种体现, 其强烈的现实指向至为明显, 到了1895年以后更表现为强烈的欧化维新取向。

乘着新文化运动“欧化”的春风, 借着“科学”的

理论与方法, 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更加强劲, 经、子、史尤其是先秦以前三千年古史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具体体现在煌煌七大册的《古史辨》之中。1926年6月, 《古史辨》第一册朴社初版, 风靡一时, 并相继于9月2版、11月3版、1927年1月4版、1930年10月5版, 可谓盛况空前。接着, 1930年9月, 《古史辨》第二册朴社初版; 1931年11月, 《古史辨》第三册朴社初版; 1933年3月, 《古史辨》第四册朴社初版; 1935年1月, 《古史辨》第五册朴社初版; 1938年9月, 《古史辨》第六册开明书店初版; 1941年6月,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初版。同时, 编辑出版《辨伪丛刊》, 囊括《古今伪书考》、《诸子辨》、《四部正伪》、《左氏春秋考证》、《书序辨》、《诗辨妄》、《诗疑》、《论语辨》、《穀梁真伪考》、《朱熹辨伪书语》、《子略》等, 在《古史辨》上广为宣传。1926年9月, 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信札中高度评价了他发动的疑古运动: “你在史学上称王。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 便

收稿日期: 2016-10-12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16 年度基金项目“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互动: 论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新解析”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爱国(1970—), 男, 江西东乡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颜英(1977—), 女, 江西东乡人,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sup>[2]46</sup> 1935年1月10日,冯振在为陈柱《子二十六论》所作“叙”中言:“晚近诸子之学浸兴。顾多竞相异以疑老、疑庄、疑孟、疑荀、疑管、疑晏、疑孙、疑吴。”<sup>[3]叙.2</sup>

对此勃兴的疑古思潮,章太炎深感忧虑:“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辟之,使人不为所愚。”<sup>[4]79</sup> 基于其深厚的中西学根底,特别是其精湛的小学、经学、子学与史学根底,章太炎对疑古思潮痛加针砭:“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疾者尔。”“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sup>[4]13,14</sup> 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源流、理论与方法,新学伪经说、儒家托古改制说、诸子托古改制说、老子晚出说等,均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出了“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子出于王官”等看法。这些批判和认识,对于当时“科学”派的疑古狂热无疑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抗日氛围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对于今日我们重新反思当时的疑古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思章太炎对疑古思潮批判的原因、得失与效果,还可以促使我们深入认识章太炎在近代学术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

## 二 “灭学之祸”:对康有为公羊史学“疑古”的批判

晚清公羊学派强调经世致用,认为传统的儒家古文经典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富国强兵、维新变法,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宣判古文经为刘歆帮助王莽改制所造的伪经;又认为儒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决定重新诠释具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儒家今文经,把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与自由民主宪政学说融入儒家学说中,对儒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转化。于是,一股批判伪经的“疑古”与推崇诸子的“托古”思潮喷发而来。“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而立学官之‘古文经传’,至此皆变为可疑之书”,《新学伪经考》是为代表;诸子百家也全部成为伪造历史以表达改革理想的政治家,“老子之托于黄帝,墨子之托于大禹,许行之托于神农,皆各人拟一理想人物,托诸古人,以立其学说者也。盖孔子亦沿古来之风习,托尧舜为名以行其改制之实者”,《孔子改制考》是为代表。“公羊学派诸子之目的,既利用此学为鼓吹社会革命之手段,故其学理,不甚充分,且多偏于主观”<sup>[5]65,70,73</sup>。公羊学派的历史观显然富有极强的主观性,完全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而非严肃认真的学

术研究,但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确实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梁启超誉《新学伪经考》为“飓风”,《孔子改制考》为“火山大喷发”、“大地震”<sup>[6]79</sup>。虽然二书并非学术著作,梁启超批评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sup>[6]78</sup>,但对现代疑古思潮的勃发却产生了重大作用,“《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sup>[6]80</sup>。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的历史观,显然对民国时期的疑古史学的发作起了重要影响。由于其采取的看上去是严格的考据形式,但表达的却是向西方学习的取向,并融入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因此,晚清疑古史学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终结,反而在民国时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杨向奎指出,民国疑古史学“没有完全脱离今文学家框框,还徘徊于所谓‘托古改制’今文家的圈子之中”<sup>[7]100</sup>。1923年5月25日,钱玄同写《答顾颉刚先生书》,相信康有为阐发的先秦诸子“托古改制”论,认为:“秦汉以后的学者太无见识,胡里糊涂地相信这是真人真史,直到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才把它弄明白了。”<sup>[8]21</sup> 吴泽、袁英光指出,古史辨派“承受康有为公羊学派的学说,深入一步怀疑古史古书之真伪,进而有推翻古史的计划”<sup>[9]</sup>。裘锡圭认为,顾颉刚深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影响<sup>[10]278</sup>。李学勤也认为,“真正把顾先生引上考辨古史道路的则是康有为”<sup>[11]51</sup>。顾颉刚本人也认可这一点。1926年,他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回顾:“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意履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期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sup>[12]40</sup>。可见,顾颉刚相信康有为阐发的诸子托古改制、伪造历史的说法。1933年,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又指出:“康氏所发见的事实确已捉得了子学和经学的中心。”<sup>[13]242</sup>

章太炎也认同康有为的历史观对民国疑古史学的影响,认为:“民国以来,其学虽衰,而疑古之说代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假托。”<sup>[14]37</sup> 在此,章太炎

点出了公羊史学与疑古史学之间的消长关系。然而,对于掀起近代疑古风暴的康有为,章太炎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书,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sup>[15]8</sup>章太炎反复强调孔子不是改革家而只是史学家,批判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指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子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sup>[16]179</sup>基于康有为历史观的先入之见,章太炎批判其疑古的方法,即“凡古书不合己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认为其大有问题,假定“尧舜是孔子所伪造”,而“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那么,推而广之,“迂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继续推演下去,“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孰料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sup>[17]11</sup>。章太炎极为忧虑的是,康有为这种先入之见的疑古方法将导致“什佰于秦火”的“灭学之祸”。

### 三 “打破历史”:对疑古史学的历史观的批判

疑古史学渴望富国强兵,期待中国迅速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认同进化史观,认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有一种退化史观或者说复古史观,这种史观在先秦发源,儒家经典与诸子经典中皆有,只有打破这种历史观,中国才能求得进步,而打破这种历史观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儒家与诸子经典为伪书,或者儒家与诸子在托古改制,这样国家进步的历史文化障碍就被消解于无形之中。顾颉刚谓:“中国人向来有个‘历史退化观’的谬见,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愈到后世便愈不行,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种在每个国人的脑海中,使大家对于当世的局面常抱悲观,而去幻想着古代的快乐。目前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易进步,这也是一个大原因。”<sup>[1]122</sup>为了消除民族国家繁荣富强、社会进步的障碍,疑古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打鬼”、“捉妖”与“破坏”。1927年2月7日,胡适在致浩徐先生的通信中说:“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今译巴斯德)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sup>[18]113</sup>当时就有人指出,疑古学家做的是“破坏的功夫,‘捉妖’、‘打鬼’的

事业”,“扫除邪孽,清算烂账”,“在那半生不熟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sup>[18]114,115</sup>。顾颉刚也反复强调,破坏古史、否认六经,就是要推倒其神圣的地位,特别是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子的神圣地位。1931年,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言:“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sup>[19]224</sup>1933年,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又说:“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我们辟《左传》伪,也只要辟去《左传》与孔子的关系,使后人不再说‘左丘明与孔子俱乘传如周,观百二十国宝书’,以及‘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等话”<sup>[13]243</sup>。但是,打破经典的神圣性,打破上古历史的神圣性,打破儒家道统的神圣性,打破民族一元化的神圣性,是否一定要以否定历史、否定古书为代价,这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否定历史、否定古书的结果,必然是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破坏。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说法就不像研究历史的态度,“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sup>[12]60</sup>。顺着这种研究思路,“高文典册”的被怀疑、被打倒、被否定,乃至被摧毁,就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古史古书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因此,章太炎揭穿疑古史学的疑古真相:“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sup>[4]13</sup>顾颉刚很明白地表达了这种意图:“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sup>[12]55</sup>

早在1911年,章太炎在致吴承仕的信中就坚决反对公羊学派的疑古,认为其是“陵夷国性”,“残摧国故”,“自摧汉族”<sup>[20]4</sup>。章太炎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全是革命者的功劳,还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生根开花的因素。1922年6月15日,章太炎在致柳翼谋的信中,强烈批判胡适的疑古是故意抹杀历史,指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

史。”<sup>[21]740</sup>胡适“疑古”重在破坏中国文化的基础，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国文化；而康有为的“疑古”尽管也有破坏，但重在原有基础上建设中国新文化。因此，章太炎认为，胡适“疑古”的危害性有过于康有为。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演讲中指出了古今史家疑古的差异性，他认可古代中国的疑古，批判民国时期的疑古，认为民国时期的疑古仅仅是想要“打破历史”，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有疑疾”，“昔蜀之譙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无如今之考古者，异于譙周、苏辙，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sup>[4]13</sup>。章太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已经内化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他严厉批判意欲打破中国历史文化的疑古史学是其应有之义。当代学者也多指出了疑古史学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是一体的，这就是其强烈的反传统、反封建、反神圣色彩。梁韦弦指出，其“受反传统治史思想的影响”，导致“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意义的估价，只见其害，不见其利”<sup>[22]29</sup>。李学勤认为，顾颉刚之所以产生疑古思想，首先一点就是不相信孔子的神权性<sup>[11]53</sup>。沈颂今认为：“‘古史辨’把矛头首先对准经，主要针对以《尚书》为中心的六经，经书在当时是很神圣的，这对传统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sup>[23]231</sup>正是由于其极为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反神圣立场，其先入之见与“智子疑邻”的精神也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王元化谓其“胸中横亘先入之见，所见莫非伪者”<sup>[24]</sup>，李锦全谓其实际上起到了“砍掉古史的效果”<sup>[25]</sup>，因此，饶宗颐呼吁：“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亦要避免使用像‘大胆假设’之类的口号先入为主地作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功夫。”<sup>[26]</sup>事实上，随着抗日战争的临近，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疑古史学也就“由原来的‘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原则，变为‘宁信古而失之，不可疑古而失之’的原则了”<sup>[9]</sup>。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一味模仿滥用，的确应该成为我们今日必须吸取的严重教训。

疑古史家批评古人伪造历史的原因是好古而又缺乏历史观念，“在这双重的捣乱之下，弄得中国的古书与古史触处成了问题”，古人不仅没有保存好史料，而且也没有去发现史料、甄别史料，只知道伪造

历史，“战国、秦、汉之间，这种东西不知出了多少”<sup>[12]119</sup>。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是严重缺乏事实依据的。中国古代不仅很早就有历史观念，而且有专门的史官制度，不能说古人不善于保存史料。六经皆史，也说明古人搜罗史料的范围其实是很宽的，古人是善于发现史料的。秦代焚书禁书，是一次史书与史料的浩劫。汉代是重新整理史料、保存史料、发现史料、扩大史料、大规模撰写历史的时代，更不能说是缺乏历史观念，也不能说他们在大规模伪造历史。汉晋末年，中国的史书与史料又一次遭到战争大规模破坏，因此六朝时期也是一次重整史料、保存史料、发掘史料、大规模撰写历史的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疑古史学都把它看作是大规模制造伪书伪史的时期，恰恰是缺乏历史观念的表现。我们不能一味以现代历史观念去剪裁古人的历史观念。李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古书的发现，其重大意义在于，不仅可以改写我们对于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sup>[27]4</sup>。美国学者夏含夷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汉写本总体上倾向于证明中国传统文献的真实性，让‘疑古派’史学不攻自破。然而战国时期的郭店和上博简却又动摇了这些文献的稳定性。”<sup>[28]56</sup>也就是说，古书虽然是真实的，但由于不断地流失散佚以及时代的变化，古书的内容与形式会出现一定的变异。李零反复指出：“作为书本的经典，它的形成，主要是汉代。经过魏晋、隋唐，最后到宋代，很多经典被固定下来。而汉代，如果你理解当时的气氛，也是一种文艺复兴，也是一种传统的断裂和重新接续。它有一点像我们的考古发现，也是一种‘寻找回来的世界’。”<sup>[27]469,485</sup>裘锡圭深有心得体会地说：“说有易，说无难。”<sup>[29]286</sup>“出土简帛古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古书真伪问题上应该注意古书形成和流传等方面的特点，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sup>[30]316-317</sup>

疑古史学把古书的成书过程想象得很单纯，似乎古书成书以后就一成不变，就不会由于各种客观的（如战国末、秦末、汉末、晋末的战争的破坏，保存或书写形式的变化）或人为（如秦始皇焚书禁书）的原因一再重编重写，重编重写的古书由于有了后人的言语与想法，有了后人的剪裁加工，那就变成了伪书。同理，对古史的形象也是如此，以为简单的、最早的古史才是真史（极端者认为没有所谓古史，古史

就是故事),随着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充实化、丰富化、多样化、复杂化的古史就是伪史。说古人没有历史观念,那也只能说古人没有现代历史观念,如进化论、唯物论的观念。古人实际上有自己的历史观念,有自己的信史准则,有自己的史学规范,有自己的史家标准。如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司马迁的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就是司马迁的方法论,“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认识论。

#### 四 “吹毛索瘢”:对疑古史学的方法论的批判

章太炎在批评疑古史学“打破历史”的历史观的同时,对疑古史学“吹毛索瘢”的方法也进行了检讨。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大批“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的所谓“科学”史学方法,认为一般的考证方法无可厚非,“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中国古代史学亦不乏怀疑反思精神,“古人之治经史,于事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sup>[4]13</sup>。实事求是为古今史学家通有的科学精神。章太炎所批判的并非具有一般怀疑批判精神的疑古考证,而是针对中国历史文化普遍怀疑的所谓“疑古太甚,为一部分学者所独有”的史学研究现象。1924年7月上旬,章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中指出,疑古史学的研究方法仅仅是“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不知古书“疏漏”在所难免,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疑古实际上会导致无书可读,“著书若无疏漏,本无此事,况古籍至今,抄写脱漏,在所难免。……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耳”<sup>[31]283-284</sup>。提倡“二重证据法”、实践“古史新证”的王国维,亦认为,疑古史学“疑古太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sup>[32]247</sup>。

章太炎的批评也得到许多当代学者的认同。裘锡圭认为:“他们求之过深,有好多观点其实并不正确,但他们却要用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来评判古书的时代,那就出问题了。”<sup>[33]213</sup>陈鼓应指出,他们方法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抓住一些片言只字,或一些孤证,便对整本书进行论断”<sup>[34]68</sup>。从当时到当代,许多学者批评疑古史学过分使用默证方法。所谓“默证”,就是“因现存文献不见即以为其无的一种逻辑

推演方法”<sup>[35]91</sup>。1925年4月,《学衡》第40期刊载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大批顾颉刚“几尽用默证”的研究方法,认为其方法演绎的必然结论就是“古史层累地造成”,“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丛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事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稀矣”<sup>[36]43-44</sup>!裘锡圭也指出:“过分使用‘默证’,是古史辨派的一个重要缺点。”<sup>[10]271</sup>默证法其实就是顾颉刚自己所说的“讲故事”的方法。许冠三指出:“胡以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故事;顾则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sup>[37]524</sup>顾颉刚自己也承认:“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故事的方法。”对于古史,“我们用了事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故事而已,故事越讲越详细,越讲越生动,也就越讲越离谱,越讲越夸诞,“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sup>[12]53,54</sup>。那么,既然古史仅仅是故事,后人研究古史不过是不停地在讲故事,研究得越深入,材料越多,不过是故事越丰满,既然故事在不断变化、详细化、生动化,当然可以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去求得。由于故事的素材总是越来越详细,但总是有疏漏,因此用默证法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确实是层累地造成的,傅斯年谓其可作为“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sup>[2]46</sup>。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所有的古书都是不可信的,所有的历史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后来的历史,后来的研究,都是以前人的言说为基础累积起来的。胡新生批判这种“历史演进的方法”重在揭示传说演变和史料作伪,它对古代传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完全推倒的处理方式,从而变现出一种明显的疑古过甚的倾向<sup>[38]</sup>。李零批评疑古史学的“层累”、“伪书”说实际上是不明古书的成书过程:“古人早就有辑佚工作,人们一直就在把古代的零章碎句,甚至是完整的书,重新加以改造。这样的书,如果套用真伪的概念,用这样的概念去衡量,有时候是冤哉枉也。”<sup>[27]475</sup>章太炎并没有直接批评疑古史学的“故事”研究法,只是批评其抓住古史古书的疏漏大肆攻击,进而全盘否定的吹毛求疵的方法。

疑古史学虽然赞成求真,但其“故事”研究法已

经基本上不相信历史文献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反映的历史观念,故只能相信考古发现了。章太炎对疑古史学只相信考古发现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考古学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一方面,考古学对没有历史文献或者缺少历史文献的地方是极为有益的,但对历史文献丰富的地方,只有辅助作用;另一方面,考古发现仍然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因为“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何况“器物亦有伪造品”,更根本的是出土的器物极为有限,以有限的器物如何去考证无限的历史。章太炎的结论是,考古学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研究而言,只有辅助作用,更不能因为考古没有发现就认为其历史不存在,“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做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西方考古学发达,有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那就是那些历史文献缺失、文明断裂的国家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复原历史,中国历史文献丰富详实,为什么反而不相信历史文献而一味求助于器物,“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sup>[4]76,77,79</sup>。疑古史学对文献吹毛求疵而相信器物,但所谓没有疏漏的文献与器物总是极为有限的,造成了疑古永远有理、古史无法重建的“顾颉刚难题”。这就是张京华所批评的:“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疑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sup>[39]144</sup>这个难题早在1931年顾颉刚就已经体会到了,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感叹道:“我们要打破旧说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难”,因为史料太少,“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了,太汗漫了”<sup>[19]225,227</sup>。

在猛烈批判疑古史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章太炎针对疑古史学家常常使用的名词术语、思想线索、时代意识、文体等方法,提出了考据辨伪的基本方法,那就是根据实事,如地理与天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所能轻易伪造的。章太炎以地理证《禹贡》不属于后人伪造,以天象证《尧典》也不属于伪造,“要知凡后人伪造之书,只能伪造虚文,不能伪造实事。关于天官、地理,更难伪造”,“《尧典》、《禹贡》既不能证其伪造,则尧、禹之不得怀疑,无待繁言而解矣”<sup>[4]74-75</sup>。所谓“伪造历史”,有的

不过是“描述过甚”,“此类之事,如其与大体无关,则存而不论可也”,如《史记·留侯传》中记载的汉高祖见商山四皓事,《后汉书·严光传》中记载的严光以足加帝腹事,章太炎主张对于此类在疑信之间的历史事件可以存而不论,“诸事在疑信之间者,皆应存而不论,不应悍然生疑”<sup>[4]76</sup>,更不应该据此就轻易怀疑记载该事件的书籍为伪书。

##### 五 “忌刻之心”:对日本疑古史学的批判

近代日本也兴起了疑古史学,但日本疑古史学怀疑的却主要是中国之古,即中国的上古三代历史记忆的真实性。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作了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演讲,后发表在1909年8月刊行的《东洋时报》第131号,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与“三皇五帝抹杀论”,谓“尧舜禹”属于儒家托古,“三皇五帝”为道家老庄派托古,均非历史事实。这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的观点极为相似。此后,1911年12月4日,他在《东洋时报》第2卷第12号上刊发《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1912年4月,他又在《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刊《〈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反复重申其论点。1912、1913、1914年,其学生桥本增吉先后在《东洋学报》第2卷第3号、第3卷第3号、第4卷第1号、第4卷第3号连载《〈书经〉的研究》,声援白鸟库吉的观点。疑古史学在日本爆发,疑古与反疑古的较量由此拉开。日本史学界也并非都相信疑古史学,林泰辅就反复发表批判文章。

对于日本疑古史学,章太炎也是不遗余力地鞭辟、发掘日本疑古史学背后的心理动因、民族文化动因与政治文化动因。章太炎批评日本疑古史学家由于自己开化晚,以至也不相信中国开化早,属于以己度人,故有“尧舜禹抹杀”论。1935年5月,章太炎在章氏星期讲演会的演讲中指出:“日本人谓尧、舜、禹皆是儒家理想中人物,彼自以为其开化之迟,而疑中国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认为日本疑古史学的背后是文化上的“自惭形秽”,并在这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滋长了“忌刻之心”,“日本开化在隋唐间,至今目睹邻近之国,开化甚早,未免自惭形秽,于是不惜造作谰言,谓尧、舜、禹为中国人伪造。非但如此而已,即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史》、《汉》所载彰明较著者,亦不愿称说。其所常言,多举唐太宗以后事。此其忌刻之心,不言可知,而国人信之,真可哂

矣”<sup>[4]73-74</sup>。廖名春指出,日本疑古史学家白鸟库吉“鼓吹‘尧舜禹抹杀论’,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的战胜国的优越感,是为扩张侵略政策服务的。胡秋原说他参加了土肥原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sup>[40]268</sup>。

章太炎更认为日本史学界对“大禹治水”的怀疑纯属吹毛求疵,犯了极端怀疑的错误。他说:“日本人复疑大禹治水之功,以为世间无此神圣之人。不知治河之功,明清两代尚有之,本非一人之力所能辨。大臣之下,固有官吏兵丁在,譬如汉高祖破灭项羽,又岂一身之力哉。此而可疑,何事不可疑?”<sup>[4]13-14</sup>章太炎批评日本疑古史家“疑禹治水为无其事”属于“浅薄幼稚”的一种借口,“夫禹之治水,合天下之力而已督率之耳”;日本疑古史家由怀疑“大禹治水”进而怀疑尧舜其人,而“吾国妄人”居然信服,章太炎感到深深的悲痛:“日人不愿居中国人后,不信尧、舜,尚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籍昭彰,反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信可哀已。”<sup>[4]74,75</sup>章太炎在治经、子、史之际,并非没有怀疑精神,但对疑古史家以先人之见大面积抹杀历史与古书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 六 “尊信国史”:对章氏疑古史学批判的反思

“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sup>[12]89</sup>,最终却走向疑古,这出乎章太炎意料。但章太炎对于疑古史学的发作确实有推动之功。就历史时代需求而言,在清末,为了实现推翻满清政府、建设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章太炎开始了对孔子与儒家经典的革命,把孔子由圣人还原为一个历史学家,儒家经典由圣经变成普遍的史学作品。这与维新派的伪经伪史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就个人影响而言,顾颉刚的疑古就受到章太炎的直接刺激,“要是我没有亲见太炎先生对于今文家的痛恨,激动我寻求今文家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会搜读《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sup>[12]91</sup>。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所有的儒家经典与诸子经典以及由此构造的先秦历史几乎都遭到怀疑,这就完全超出了章太炎的文化底线,引起了他的猛烈批判。

章太炎为什么要猛烈批判疑古史学?主要是基于其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强调中国自己要推陈出新,反对模仿外人,认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

史、灿烂文化的文明大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追求。

第一,认为疑古史学会打倒国史,动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犹如人要是有人性一样,章太炎极为强调国家要有国性,这是国家认同与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而国性的养成有赖于历史文化,“欲保存国性,则不能处处同化于外人”<sup>[31]281</sup>。本国历史文化是养成本国国民爱国之心的基础,“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sup>[4]10</sup>。爱国主义精神的养育,完全由本国历史文化造成,“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人不读历史,则无爱国心”<sup>[41]207</sup>。爱惜本国历史文化,犹如爱惜自家的家谱一样,不可忘记历史记忆,这是本国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账簿,否则爱国主义无从谈起。他说:“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sup>[41]302</sup>一国历史文化是一国立国之基、国性所涵。章太炎对自己过去疏忽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深感忏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在日本侵华日益严重之际,“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而疑古之说“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复兴之望”<sup>[14]37</sup>。疏忽历史文化,怀疑历史文化,后果是家国之事茫然不知,大大有利于列强侵略,而极不利于抵御外侮,“民国以来,国人对于史事亦甚疏忽矣。或且鄙夷旧契,不屑观览,甚有怀疑旧契者,于是日蹙百里,都在迷离恍惚之中”<sup>[4]100</sup>。

第二,认为疑古史学无独立创新之精神,专法古人,专法外人,这是章太炎反复批评的。1916年8月5日,章太炎在江苏省教育会附属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的演讲中呼吁:“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古人,专发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可。”<sup>[31]155</sup>章太炎对日本疑古史家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深恶痛绝,予以严厉批判。

章太炎虽然不疑古,但具有怀疑精神,并不完全信古,“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章太炎对古书也是将信将疑,对子书尤为怀疑,“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sup>[15]7,8</sup>。譬如对疑古史学广为怀疑的《尚书》,章太炎也是严重怀疑的。1924年,他在致吴承

仕的信中说：“《尚书》今古、文，除《说文》所引、《正始石经》所书者，难信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唯《熹平石经》稍有证据，其余则或在纬书耳。”不过，章太炎的怀疑极为慎重，“然如太史所述《尧典》、《洪范》，恐文字与训说皆合古文”<sup>[20]84</sup>。章太炎对老子其人其书没有怀疑，反而对疑古史学所持老子晚出说、老子非孔子师说进行了反复批评，但章太炎也严重怀疑道家经典《文子》，“今本疑即张湛伪造，与《列子》同出一手也。《隋书·经籍志》有《文子》十二卷，宜即此伪本”<sup>[41]54</sup>，对《列子》、《吴子》、《关尹子》、《孔丛子》、《孔子家语》、《太公阴符经》、《黄石公三略》等，章太炎也不相信。今日看来，章太炎的怀疑仍然有过当之处，但相对疑古史学而言，章太炎并不真正疑古，只是具有一种怀疑的精神罢了。

对于章太炎的疑古史学批判的局限性，早在民国时期疑古史家就已经批评过他了。顾颉刚指出：经学方面，“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史学方面，“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碎短书；更一笔抹杀殷墟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鄂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文学方面，“他虽是标明‘修辞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语言文字学方面，“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唐韵为主”；这各个方面，“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因此“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sup>[12]41-42</sup>。这个批评有其合理之处，章太炎的确有褒爱中国文化之癖好。1922年6月15日，章太炎自己也曾经说过：“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sup>[21]741</sup>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章太炎的怀疑精神始终存在。他并不完全信古，其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推崇主要还是基于其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其解说儒家经典与诸子学说往往石破天惊，就是因为其创新之处颇多，而并非如顾颉刚所批判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早在诂经精舍学习时，章太炎说经就不拘一格，章师俞樾已经批评过他“不知守家法而重师说”的风格，“曲园以其说经好为创解，不知守家法而重师说，颇不喜之。常告诸生曰：‘章氏子非吾徒也’”<sup>[42]130-131</sup>。这种“好为创解”的研究方法，始终为章太炎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到

晚年在苏州讲学时还是如此。疑古史家批评：“他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不相信甲骨、金文。”<sup>[7]96</sup>章太炎确实表示过：“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sup>[4]76</sup>鄙视史学界一味去搞考据与考古，而漠视现存历史文献与历史经验教训本身，“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sup>[4]79</sup>。但章太炎并非全然不相信古文文字与器物，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王仲荦批评：“现在还有人说太炎先生死顽固，不相信甲骨文，其实不是这样。我二十多岁时，一次到他家去，见他从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抚摸着说：‘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安阳出土的甲骨片，有些是没有字的，古董商人将无字的仿刻上文字，可以卖高价。太炎先生怀疑的是这一类假的甲骨文，对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sup>[42]134</sup>最为有趣的一件事是，章太炎要求与刘半农比赛写考据甲骨文的著作，看谁写得快、写得好，刘半农不敢应战。陈存仁的记载言：“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师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个人做一本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得是活的。’”<sup>[42]213</sup>这一趣事也形象地表明，章太炎并非不重视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而是批判疑古史学怀疑历史文献过头。

虽然疑古史学批判章太炎信古过头，不相信甲骨文与金文，有其过当之处，但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亦有过当之处。疑古史学的发生要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脉络中去寻找，而不仅仅是公羊史学与中国传统辨伪思潮的影响。富国强兵的渴望，使得我们对学习西方非常强烈，对自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根源想要刨根究底，结果引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质疑与批判，疑古史学从而有了丰厚的土壤。疑古史学对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史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讨，是有其积极的学术与思想意义的。其引发的疑古与信古的辩论发人深省，从而使得释古成为共识。其随着时间推移而自觉的分化与转向，也说明疑古史学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贡献，不能一概抹杀。疑古史学全面怀疑经、子、古史，简单片面，史观与方法论均有一定问题，确属过当。但其为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的理论与经验，确实是当务之急。其清理中国传统文化，扫除进步的思想障碍，解放思想，的确是为了中国更好的发展，也是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

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猛烈批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保护好民族历史记忆,增进民族认同与忧患意识,为建设一个完整的、富有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也属于迫切任务。从短期来看,疑古史学主张的推倒传统、打破历史、解放思想,以期更好更快地学习西方、赶超西方,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章太炎所主张

的:坚持文化自信,强化本土历史文化记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认同,从事自己的文化创新,寻找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反对疑古史学打倒古史古书的行为,也属必要。疑古史学的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章太炎的研究亦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二者看似对立,而意图却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 参考文献:

-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傅斯年.傅斯年遗札: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3]陈柱.子二十六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5]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7]杨向奎.论“古史辨派”[C]//陈其泰,张京华.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 [8]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9]吴泽.袁英光.古史辨史学思想批判[J].历史教学问题,1958,(10).
- [10]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11]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12.
- [1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M]//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3]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G]//顾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14]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M]//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5]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6]章太炎.答铁铮[M]//马勇.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17]章太炎.尚书略说[M]//太炎先生尚书说.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8]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M]//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G]//顾潮.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20]章炳麟.章炳麟论学手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1]章太炎.与柳翼谋[M]//马勇.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22]梁韦弦.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23]沈颂今.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24]王元化.致邵东方君书[J].读书,1992,(7).
- [25]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J].中山大学学报,1956,(4).
- [26]饶宗颐.古史重建和地域扩张问题[J].九州岛,1999,(2).
- [2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8.
- [28][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M].周博群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9]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C]//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30]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C]//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31]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2]王国维.古史新证[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33]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34]陈鼓应.老庄新论(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35]张富祥.“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C]//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6]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C]//杨庆中,廖娟.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 [37]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 终于信[C]//陈其泰,张京华.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 [38]胡新生.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J].史学月刊,1993,(6).
- [39]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 [40]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C]//陈其泰,张京华.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 [41]章太炎.蓟汉微言[M]//蓟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42]陈晨.章太炎轶事:1869—1936[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ZHANG Tai-yan's Criticism to the “Yi Gu” School

HE Ai-guo<sup>1</sup>, YAN Yi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On criticizing the “Yi Gu” school, ZHANG Tai-yan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intensely representative figure. His criticism to the “Yi Gu” school was based on his strong cultural nationalism because it denied from traditional Sinology to the fun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bonded with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ZHANG criticized the “Yi Gu” school quite sharply and incisively in his criticism to the conception and methodology of it. Besides, there were also some mistakes, such as his excessively severe criticism, hi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academic value and time significance of the “Yi Gu” school.

**Key words:** the “Yi Gu” school; ZHANG Tai-yan; cultural nationalism;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凌兴珍]